

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

肖贵清 麻省理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重要思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始终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展示出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精神和面对复杂局面的战略定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81(2018)04-0094-05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8.04.019

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充满了曲折,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带领中国人民先后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中富起来和强起来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在四十年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就,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正是由于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强国富民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1]17}。

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重视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回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历史征程,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是党和国家事业成功的前提。党在指导思想和理论上的创新,特别是在关键问题和突出环节上的理论创新,也就是能够结合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局限于现成的模式和已有经验,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这往往预示着工作和事业上的变革与新的转变和新的开始,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党的理论创新与思路转换,往往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解决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关键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改

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

十年“文革”结束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保障国家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凝聚民心,汇集党内改革力量,达成改革开放共识,彻底扭转党和国家的不利局面,积极稳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平稳转移。总而言之,就是“文革”后的中国要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考验的不仅仅是在具体方针政策上的调整 and 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执政思维和治国理念的转变。而执政思维和理念上的转变,充满不确定性,难度更大也更加复杂,这正是党中央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要把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2]50}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确定了领导核心地位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实现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上的调整和转向。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尤其是对从1957年开始长达二十年时间“左”的惨痛教训的反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3}摸索出并不断完善着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

* 收稿日期:2018-04-17

作者简介:肖贵清(1959—),男,河北灵寿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麻省理(1988—),男,陕西白水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实践”^{[1]48}。这一命题的提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从历史方面分析还是从现实层面考虑,对中国还是对外部世界,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影响深远。

首先,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四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的意义。新中国成立33年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理清了长远的发展思路,规划了总的发展趋势,奠定了此后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命题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里所经历的挫折的反思切中要害,逐渐摆脱了在过去迟迟未能很好解决的困境和思想上的迷误,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念和思路上的调整和转变。

革命不易,建设尤难,由革命思维成功转换到建设理念上,其中的衔接往往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共产党走了一条颇为曲折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者都是对近代中国发展趋势的成功因应,顺应了历史潮流、时代要求和人民的期望。改革开放事业越是往前推进,越是不断深化,社会发展程度越高,遇到的问题就越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在解决一系列新问题的过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也会随之更加丰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并不断发展着的动态命题。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持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不能也不应该采取固化和僵化观念,社会主义的具体建设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办法和经验,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在一定时期的实践中确实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做法,即成功经验。对这些成功经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使用边界和适用范围。过去是成功经验,不等于今天也一定能复制曾经的成功。当下的成功经验,同样不等于明天一样能成功。

正是从改革开放开始,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虽然在国家发展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但是只要道路选择正确,问题和困难总能克服,事实也正是如此,“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4]。

其次,中国以自己的发展为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道路选择,中国智慧和方案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既是其初心也是其责任,同时也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能力。邓小平当年提出这个命题,就是要突破苏联模式,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全新的思路 and 理念,社会主义建设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性模式,“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3]292}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立足本国国情和现实状况。其实,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式

可循,并及时指出要“以苏为鉴”,但问题的发现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后来的实践证明,苏联也没有完全搞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既然学习的对象本身已经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和严重的缺陷,后来的模仿者在相当程度上也难以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要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仍然需要进行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特色”开宗明义,首先是彰显中国的特色,符合中国的实际与基本国情。但“中国特色”不仅仅指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特点,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既然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在现代化建设上不存在统一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挫之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推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5]10}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具有双重意蕴,既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包含着对二十世纪后期和二十一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这种意蕴也日益凸显出来。

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立足于解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现实中加以灵活运用。他本人虽然讲,“我读的书并不多”^{[3]82},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理论层面的原创性贡献,成为以他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政治家的理论创造与单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创新不同,不能简单用后者的标准来要求前者。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理论如何解决面临的现实和长期问题,力争避免过多的脱离实际的抽象争论,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更加明确。其次是结合其丰富阅历,进行理论创新,而且特别看重理论产生的具体实践效果,也就是“要管用”,较少因思维固化而产生对某些理论的偏执倾向。

党的十四大报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构想,是在承认人类历史存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每一个不同性质的社会中,也包含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先是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开始,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典型发展阶段。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采取的对策当然也不应该相同。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注意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不同

阶段采取相应的革命策略,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许多艰辛探索,积累了大量经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3]116}，“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269}。然而真正找到这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然这样的认识和实践是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以后的基础上进行的,关键点就是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更加清醒和冷静,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3]252},意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使用和适用的范围、广度和深度存在很大的区别,政策落后于现实不对,超前于当下同样错误。在这个不发达阶段,核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同时对这个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给予充分的估计,“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6]219}因为生产力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速发展,甚至跨越式发展,但这个过程总是需要时间的,我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耐心,“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7]10}

从这时起,“三个没有变”即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国际地位没有变,成为党和国家在做出各项决策时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以此为基准,有效避免了我国在发展道路上曾经多次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倾向和盲目性。当然,随着国情、世情和党情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11}党中央在作出这一重要论断的同时,再次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5]12}

第二,社会主义本质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论述了未来社会一定是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就是生产力因素,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依赖的就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然而,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国家建设的时候,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出现了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外部封锁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存在于自身,从制度、体制到思想观念上设置了太多的条条框框,自我封闭,自我限制。中国同样不例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63-64}在动不动就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的舆论环境中,人们依然用旧观念来考虑问题,认为改革开放会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3]137}“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3]373}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从根本上纠正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错误与片面看法,彻底消除了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不必要的担忧。从此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被牢牢确立起来。把握住这点,时刻认清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即使党在工作中偶尔出现策略上的失误,也很难再发生战略层面的改变。

第三,改革开放论。十年“文革”结束之后,党的领导层认识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此不存在大的分歧和争论。问题在于改革要进行到何种程度,开放要达到什么范围,在这上面当时党内有争论。邓小平态度很明确,对内改革必须是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全方位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管理体制到政治体制等等的改革,总之改革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370}同样,对外开放也是多领域深层次的开放,对所有国家的开放,不能单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来划界。不对外开放,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国家不可能发展起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对内和对外开放——引者注)不行。”^{[3]210}改革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所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3]368}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两者关系重新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突破陈旧观念的束缚,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国家建设上出现的一系列失误和重大挫折,从经济建设角度来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认识上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水火不容。这样,虽然党在很早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8]11},但主要是学习苏联的制度、体制和模式,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党在认识上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思想观念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7]10-11}思想认识上的这种片面性和教条观念,反映到现实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经济发展缓慢,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3]264}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1979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不同于以往的看法,“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9]236}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在实践层面的不断深入和展开,党在这个问题的认识

上不断取得突破。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断。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邓小平在十四大召开前与中央领导的谈话中,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认为这正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所做的事情,“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0]1347}。根据南方谈话精神和这一重要论断,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226}。至此,我国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得以最终确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11]161}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但是这一历史性贡献的源头正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被构建出来了。

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对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他们所建立和开创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功,还有他们个人在其中所展示出来的精神力量与魅力。这些精神力量会凝聚起来,汇入政党、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血脉当中,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家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曲折。“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和斗争,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12]252}越是在历史的转折和大变革时期,党的正确领导就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对领导人的要求也越高。因此,党的领袖人物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他们个人所具备的魅力和性格特征会给他们所处时代和事业打上深深的烙印。十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1]40}。

首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改变的是策略和方法,不变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坚守。“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3]326}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和信念。如果没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做支撑,很难想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能在重重阻力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遇到挫折时排除万难继续向前推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挫的情况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3]382-383}

其次,是“杀出一条血路”的开拓拼搏精神。邓小平在领导1975年的整顿工作中,即表现出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直面问题、敢于碰硬的领导风格。虽然当时仍然处在“文革”时期,进行彻底和完全整顿的环境和条件并不具备,后来“整顿”也被迫中断,但这次整顿相当于后来改革的预演。等到他第三次复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改革舆论的形成,凝聚了改革力量。他在1978年的“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9]130}他意识到更大范围和更加有力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9]150}时间紧迫,国内形势已不允许犹豫和徘徊,他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郑重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9]143}

再次,是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情,不能用老眼光和旧标准来衡量和评判。邓小平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旧教条的束缚,对来自“左”和右的冲击,特别是“左”的干扰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法和措施,都大胆尝试。在对新事物的态度上,他一直强调“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3]367}。对于看准了的事情,大胆去尝试,不要将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空洞争论上。“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37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几年时间的实践,全国从上到下,充满朝气,焕然一新。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被迫中止的尝试,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重新被纳入实践。过去被认为是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事情也开始了大胆尝试。从农村管理体制开始,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支持设立经济特区,再到城市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经济体制方面的大规模改革,并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虽然每一次改革都有不同意见和争论,甚至遇到阻力和反对,但都在邓小平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得以推进和实行。

最后,是在危机面前泰然自若的战略定力。“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正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大有希望。”^{[1]45-46}战略定力是卓越领导人必备的核心领导要素。正当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时候,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挫折,面临较大考验。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退回原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将战略大局稳住并打开了新局面。在稳定国内局势方面,他多次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定下的改革开放等大政方针不能变,不能因为有挫折就不改革不开放,

相反要继续加强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3]345}。南方谈话承前启后,对许多长期困扰人们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新的解释,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消除了意识形态方面一些无谓的争论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干扰,稳定了党心民心,将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邓小平积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坚决顶住外部种种压力,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他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坚定对国际形势大的判断,并不因为外部的暂时不利局面而改变国家总体上的对外开放态势。从后来的结果看,也正是由于邓小平抓住了这些关涉中国发展前途重大问题并使其得到顺利解决,坚持既有的战略判断不动摇,稳住了阵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得以经受住考验,并以更加积极和稳健的步伐继续前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四十年,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和完善的四十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既有历史条件下,做出了突出贡献,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众多棘手难题。“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1]38-39}

参考文献:

-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 [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 [6]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 [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11]胡锦涛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 [12]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立 早

Deng Xiaopi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XIAO Gui - qing ,MA Sheng - li

(School of Marxism , Ts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 , Beijing 100084 ,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ered around Deng Xiaoping , summarize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thesi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nd other important thoughts , such as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eory , the socialism essence theory , the the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re start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ng Xiaoping always kept a firm belief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 showed the courage to blaze new trails , bold innovation and face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And he provided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n persist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Deng Xiaop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